

2018年5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探索与争鸣》学术指导委员会原委员高放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高放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学家、社会主义学家、国际共运史学家，生前有很多重要文章发表在本刊，长期关心呵护本刊成长。值高放先生逝世五周年之际，本刊特推出先生遗作，以表达编辑部全体同仁对先生的深切怀念。本文系先生生命最后阶段抱着病躯撰写的遗稿，生前未公开发表，现由先生女公子高华研究员整理定稿（中央编译局马列部资料室周佩娟女士录入初稿）并授权本刊发表，特此致谢。

——编者按

全球化的历史演变与当今态势

高放

【内容摘要】 全球化是全球众人关注的重大课题。全球化与现代化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载体逐步发展起来的。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至1991年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化两种模式对峙和对抗的格局。1991年苏联解体后，全球化呈现出五个新特点。第一，以信息化为先导的新科技革命更加全方位、加速度地迅猛发展。第二，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更加明显地从传统的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发展到了社会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第三，出现了反全球化的逆流。第四，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和平崛起，内政和外交都在摆脱、超越传统的苏联模式，探求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五，和平与发展已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当今时代主题或世界主题。未来全球化的趋势将是科技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两大主流的交汇更加密切，更富成效。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太空化、宇宙化是比全球化更加远大、更具吸引力的新千年远景。

【关键词】 全球化 反全球化 新科技革命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作者】 高放，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北京 100872）

全球化问题，我早在20世纪末就开始研究。当时发表过三篇文章：《全球化与世界前景》《从全球化浪潮看新世纪、新千年、新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现代化、全球化的消长》。^①





这三篇文章，都已收入我的文集。十多年来，我还就全球化问题发表过几篇新作。对全球化这个全球众人关注的重大课题，要与时俱进，不断深入探究，从各个相关领域和层面加深认识。有人提出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共运新特征”这个主题，正是当前我国广大党政干部十分关切甚至感到困惑的问题。近几年我有机会与从事实际工作的党政干部会面时，他们得知我是长期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老教师，便不约而同、异口同声、纷纷询问我：“现在还有国际共运吗？现在各种媒体中都看不到、听不见有关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共产党活动的报道。”我当然毫不犹豫地给予肯定性回答：“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依然有众多共产党在坚持革命活动，只是国际共运处于前所未有的低潮，呈现出很多新特点。”接着他们就十分好奇地追问我：“究竟有哪些新特点，你能简明扼要地点拨一下吗？”

我认为要讲透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共运的新特点这个重大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楚全球化历史的演变和当今的态势。什么叫作全球化？迄今众说纷纭。依我理解，所谓全球化就是把生存在全球五大洲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人群在生产和生活各方面越来越紧密地联结成一体的历史进程。远古时代，欧、亚、非三大洲的人类稍有联系，自1492年西班牙派出的航海家哥伦布等人发现美洲新大陆、1519年西班牙海员麦哲伦等人发现大洋洲，从此才开启了五洲联结一体的历史进程。很有意思的是，我经过全面观察和深入研究，发现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全球化、现代化、资本主义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化这四化形成兼程并进、重叠发展、互相交汇的奇特、奇妙进程。其中，科技的进步和科技革命是原动力和主动力，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历史纵向发展的主线，全球化则是把现代化成果横向拓展到全球五大洲的主线。前者是经线，后者是纬线，经纬线交织，构成了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大网络。

世界近现代全球化与现代化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载体逐步发展起来的，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从一开始就派生出反资本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立物。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全球化都是英国人从16世纪初开始起步的，500年来大体上经历了科技进步和科技革命的四个浪潮，即17世纪的煤炭化、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的蒸汽化、19世纪中至20世纪中的电气化和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信息化这样四个阶段。与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相对应，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从16世纪初至18世纪末的封建资本主义，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的自由资本主义，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资本主义，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社会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相对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发展也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从16世纪初至19世纪中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从19世纪中到马克思主义科学诞生以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全球化的新局面，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共产主义运动低潮。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1991年苏联解体，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化两种模式对峙、对立、对抗的格局。苏联模式的最终失败是有多种复杂原因的，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苏共领导人深受本国传统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影响，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结合本国实际，不善于吸取人类优秀文明的成果，也就是未能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认清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未能掌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全球化战胜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化的特殊规律。好在中国共产党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起，就带头开创了世界社会主义革新的新阶段。四十年来，中国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极参与全球化事业中取得了举世称赞的成就，使全球化出现了由改革开放的中国起越来越重大作用的

新局面。1991年苏联解体后，全球化出现了显而易见的五个新特点。

第一，以信息化为先导的新科技革命更加全方位、加速度地迅猛发展。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网络化几乎覆盖全球五大洲，甚至到达第六大洲——南极洲，多国南极考察队、留守站都广泛使用网络与本国保持经常联系，互联网发展为物联网，移动通信从2G、3G、4G逐步发展到5G，智能手机从声音到图像可以通达世界各地，人工智能、机器人越来越多地取代了繁重、艰险的工人劳动。基因工程的发展不仅已经可以改善众多动植物的品种，而且还能改善人类的遗传基因，可以减少人类的多种先天疾病。航天技术与深海钻探技术的大发展，真正达到了毛泽东诗词中浪漫想象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境界。分散生存在五大洲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人群，有史以来真正开始感受到“全球一村”的态势。

第二，随着新科技革命全方位、加速度地迅猛发展，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更加明显地从传统的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发展到了社会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具有六个新特征。其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在工农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的广泛运用，越来越迅速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提高了生产力社会化的程度。其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化程度也更高，私人资本已发展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越来越股份化，股份资本越来越职工化、大众化、分散化、国际化、全球化，跨国公司已从1980年的1.5万家发展到当今的近十万家。当今虽然还有垄断资本，但是竞争超越了垄断，所以跨国公司也越来越多，生产关系的社会化已超越民族国家界限，达到国际化、全球化的水平。其三，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经济、阶级、政治文化结构都发生重大变化。经济结构中服务业研发比重越来越大，农业研发比重越来越小，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脑力体力劳动差别都越来越小。阶级结构从葫芦型变为橄榄型或菱角型，即中间阶级越来越大。工人阶级的结构变化更大，从传统蓝领工人占绝大多数变为五颜六色的工人异彩纷呈，除蓝领工人外，白领（管理人员）、灰领（维修与营销人员）、金领（高管）、绿领（环保人员）、粉领（女工、会计、护士等）比重越来越大。工人阶级出现五化趋势：白领化、多领化、知识化、智能化（使用电脑、电器的工人越来越多）、有产化（有存款、住宅和股票的工人越来越多）。政治民主化、社会化的程度也更高。资本主义的民主共和国遍布五大洲。即便是有君主的王国也大多是虚君共和制，议会民主广为发展，全民公决的直接民主在代议制国家也多有推行，公民政治参与率大为提高。文化结构更显示出多元化、多样化态势，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均有发展。其四，全球化的新发展使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社会职能大为增强，国家政权不仅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强权者和守夜人，而且愈益成为推进经济、发展文化的掌门人和调节社会矛盾、缓解各种危机的磨合器。其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竞争与合作大为加强，国家关系社会化的程度也大为提高。国际经济贸易社会联系、教育科学文化交流愈益加强，各种国际协调合作组织如二十国集团、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等在协调国际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地区性的国际组织愈益增多、增强，如欧洲联盟、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美洲自由贸易区域组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组织等都在加强区域间的国际合作。其六，社会主义因素在逐步增长。这表现为各国共产党人筹办的工农商贸企业和文化教育设施、工农群众创办的各种合作所和工农大众持股的各种股份公司在增多。资本主义国家被迫采取的尤其是在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所采取的维护和增进工农大众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的举措，也含有社会主义因素。总之，要从以上六个新特征来论证和判断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确实已经超越列宁一百年前所讲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已经进入社会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第三，出现了反全球化的逆流。当今全球化是在资本主义主导下展开的，尽管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社会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然而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和弊病依旧存在，甚至更为突出。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造成的灾难表现为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更为严重，战火和战乱连年不断，环境恶化，生态破坏，瘟疫流行，等等，对此广大人民群众愈发不满。从1999年开始，凡是遇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举行七国集团、八国集团会议，或者世界贸易组织举行会议，或者世界经济论坛举行会议，等等，总有成千上万群众在会议地点举行反全球化的示威游行。21世纪以来，这种群众性、自发性的反全球化浪潮波及资本主义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的斗争形式也越来越尖锐。示威游行的群众甚至与军警发生流血冲突，屡有伤亡。尤其是在美国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从2011年9月开始，纽约工人和广大民众在金融中心华尔街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引发“占领华尔街”运动，迅速蔓延到全国上千个城市，以至波及英、法、德、日等多国。至此表明反全球化运动实质上是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灾难。有人误以为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形成世界革命形势，甚至有人在集会上高呼：“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似乎美国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开始。然而奥巴马政府并未采取镇压和驱散政策，反而公开表示同情，政府在疏导的同时采取一些抑制华尔街寡头的措施，于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只经历几个月就烟消云散了，并没有发展为华尔街革命。“占领华尔街”运动反而促使奥巴马政府加强政府协调社会矛盾的职能。从中我们应该理性地认识到，世界已进入社会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是难以引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革命任务有可能通过各种合法斗争逐步改良来实现。

当今反全球化的浪潮层出不穷，有奇形怪状的表现。2016年英国为脱离欧盟举行全民公决，结果以52%对48%决定脱欧。欧洲有28个国家结成欧盟，这本来是全球化大势所趋的产物。微弱多数的公民要脱欧，这也是反全球化的一股逆流，其深层原因在于多数公民要求共享发展的成果，不让发展成果被一群富豪和精英所独吞。2016年美国新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坚持贸易保护主义、反对贸易自由，实行孤立主义政策，提出“美国优先”，这又是另一种反全球化浊流。在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中居然美国自身出现反全球化的浊流，这也反映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已经出现了很大问题。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尽管反全球化浪潮滚滚不息，然而全球化浪潮依然势不可挡地乘风破浪迅猛前进，其奥秘何在呢？我认为是在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驱动下，经济全球化已经从欧美少数发达国家覆盖到全球五大洲几乎所有欠发达、不发达国家。有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融入了全球化浪潮，并且越来越在新全球化中起重大的推动作用。所以发达国家要逆全球化潮流，孤芳自赏，孤立行事，只能使自己越来越陷入困境。发达国家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吃够反全球化的苦头后只会把反全球化的矛头指向本国的资产阶级。只要欧盟在英国脱欧后得到更好的发展，只要英国在脱欧后长期未能重振雄风，那么英国将来还是可能重新公投入欧的。因为欧洲一体化、成立欧洲合众国是全球化大潮的历史必然。对此，恩格斯早在1893年就预见到了。这年6月底，英国《每日记事报》记者采访恩格斯时问他：“您认为成立‘欧洲联邦’的时间不远了吗？”他明确回答：“当然。一切都在朝着这个方向走，因为我们的思想正在全欧洲传播。你看（他拿出一本厚厚的书），我们的罗马尼亚的新杂志。在保加利亚我们也有这样的杂志。全世界的工人都在迅速地学习联合的艺术。”^②

第四，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和平崛起。中国在对内路线和对外关系两方面都在摆脱、超越传统的苏联模式，探求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内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苏联模式的急于求成、一国建成社会主

义转变为认清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苏联模式的单一公有制转变为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从苏联模式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苏联模式权力过度集中的一党制转变为共产党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从苏联模式的文化专制主义转变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全面繁荣文化事业。在对外关系方面，从苏联模式急于实现社会主义全球化，要社会主义国家结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长期对峙、对立、对抗，转变为采取与资本主义各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方针。

1991年苏联解体后，原有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彻底瓦解，剩下的中、朝、越、老、古五个社会主义国家各自独立自主发展，并没有也不可能再组成社会主义国家联盟，不可能再形成社会主义国家体系。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后，世界现状是资强社弱，社会主义只剩下一大四小，即中国一大国与朝、越、老、古四小国。1978年以来中国带头改革开放，对外积极参与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更进一步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三十多年来中国善于引进外国资本、外国先进技术、外国先进管理经验、外国智力人才，极大地加快了社会生产力和科技、经济的发展。到2015年，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就有可能反过来对全球化施加正面的、积极的影响，愈益减少、抑制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弊端与危害。越南和老挝自1986年实行革新以来，也与欧美、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建立了广泛联系，也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来。自2015年美国总统访问古巴后，美古关系有所改善，古巴已开始向美国出口产品。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既是当今增强社会主义实力的上策，又是以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对经济全球化作出积极贡献的新途径。前古巴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菲德尔·卡斯特罗曾经于2003年2月14日在哈瓦那召开的第五次全球化与发展问题研讨会闭幕式的讲话中指出：“古巴不反对全球化，也不可能反对，因为这是历史的规律。我们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世界上既有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也有相互声援的主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全球化。第三世界各国应该用互相声援的全球化来应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③卡斯特罗在这里所讲的第三世界国家要互相援助来应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条件下，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全球化是难以做到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只能通过参与全球化进程来抑制、减免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第五，和平与发展已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当今时代主题或世界主题。自从16世纪出现全球化浪潮以来，在长达四百多年时间段中，战争与革命一直是时代主题、世界主题。在全球化中先后兴起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总是不断通过战争来争夺势力范围和殖民地附属国，同时资本主义列强还要发动战争来镇压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来反对本国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到20世纪，甚至爆发两次世界大战，造成死伤好几千万人的灾难。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以电子信息为先导的新科技革命的全方位、加速度大发展，由于资本主义已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由于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民众投身到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斗争中来，所以和平与发展逐步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当今世界主题和时代主题。当然，当今美国的一些资本主义当权派仍然沉溺于霸权主义的迷梦，还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等，用战争手段来获取自身利益，但是大规模的战争已经难以发动。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大都已经取得独立，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已



经土崩瓦解，新独立的民族国家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中逐步振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形势难以形成。1954—1955年我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成为当今各国普遍公认的国与国关系准则，十多年来我国践行的不对抗、不冲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针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当今，经济全球化推进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股全球大潮，正在与科技全球化催生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这股全球化大潮互相汇合、交融，使全球化正在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朝着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个地球美好家园的方向发展。当今人类面临诸多共同的大问题，尤其是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物种灭绝、海平面上升、瘟疫流行、国际犯罪、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地区性武装冲突，等等。所以，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理应不分国别、族别、种别、阶级、性别、教别、政别、派别、职别、界别，共同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克服危机，造福全球人类。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深刻指出：“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们更幸福。”^④

从以上所讲的当今全球化的五个特征可以看出，今后全球化的趋势将是科技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两大主流的汇合与交融更加密切、更富成效。在其带动下，治理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民主参与）、文化全球化（多元包容）、交往全球化（旅游、移民）等都将获得更大发展，全球一村、世界大同的胜境更加接近。我在2000年撰写的《从全球化浪潮看新世纪、新千年、新世界》一文中就已提出，“全球化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尽头。太空化、宇宙化是比全球化更加远大、也更有吸引力的新世纪、新千年的前景。”^⑤自从20世纪50年代航天技术大发展以来，就开始了太空化、宇宙化新时代。太空化、宇宙化也许是我杜撰的新词，但它使全球化进一步扩展，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开拓了无限的新空间。

世界进入21世纪以来，太空化、宇宙化的确取得了更大成就。美、俄两国设置的空间站已经平安运作多年，并且实现了太空对接，美国人已经发出了不久的未来将上火星种植土豆的预言。中国的航天事业更是急起直追迎头赶上。从1999年起中国连续发射“神舟”号飞船取得成功并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是2003年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并安全返回，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继美、俄之后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未来若干年，中国将既独立自主又与美、俄等国合作，共同探测、开发月球、火星，使太空化、宇宙化取得更大和更新的发展。

注释：

① 三篇文章分别刊发于《学习时报》1999年7月26日，第2版；《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1期；《理论探讨》2002年第1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35页。

③ 徐世澄：《卡斯特罗评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第341页。

④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第3版。

⑤ 高放：《纵览世界风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第263—264页。

编辑 杜运泉